

永懷萬耀煌先生

鄔繩武

前言

我棄家逃出了魔掌，迄今已有二十六年了。

在此二十六年中，我哭了三次：一次是前年四月五日，總統蔣公的崩逝，我哭；領袖的勳業光天壤，而不親見大陸的光復，和懷念國家艱難的前途，而國家與我有血肉相連的關係。一次是：業師羅志希（家倫）先生之歸道山，我哭我親承教誨，羅師誨我不倦。猶憶四十餘年前，在中央政校讀書時，我與李琴大使同學，合譯外交名著：Seymour所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外交背景史，羅師為我們逐句逐字的訂正。抗戰時，羅先生任中央大學校長，我任四川廣安縣縣長，羅師在百忙中，託廣安鄰封縣鄉水籍吳幹先生（現任立法委員），帶了一封親筆長達千言熱情洋溢的信，時當倭寇侵我日亟，與蘇俄簽訂洛門坎停戰協定，國勢岌岌。在信中，期我良殷，勉我良深。這次萬耀煌武樵先生的謝世，我也哭了。我熱淚盈睫，泣不可仰。哭萬先生知我之深，信我之專，遇我之厚。前塵往事，湧上心頭。我不擅為文，一生看人家的文章多，自己寫的文章少。因萬先生的逝世，抑制不住無盡的哀思，在這義上，在情感上不能不草此拙文，哀悼這一時代勳業彪炳品德

粹和的八七高齡老人！

成都中央軍校之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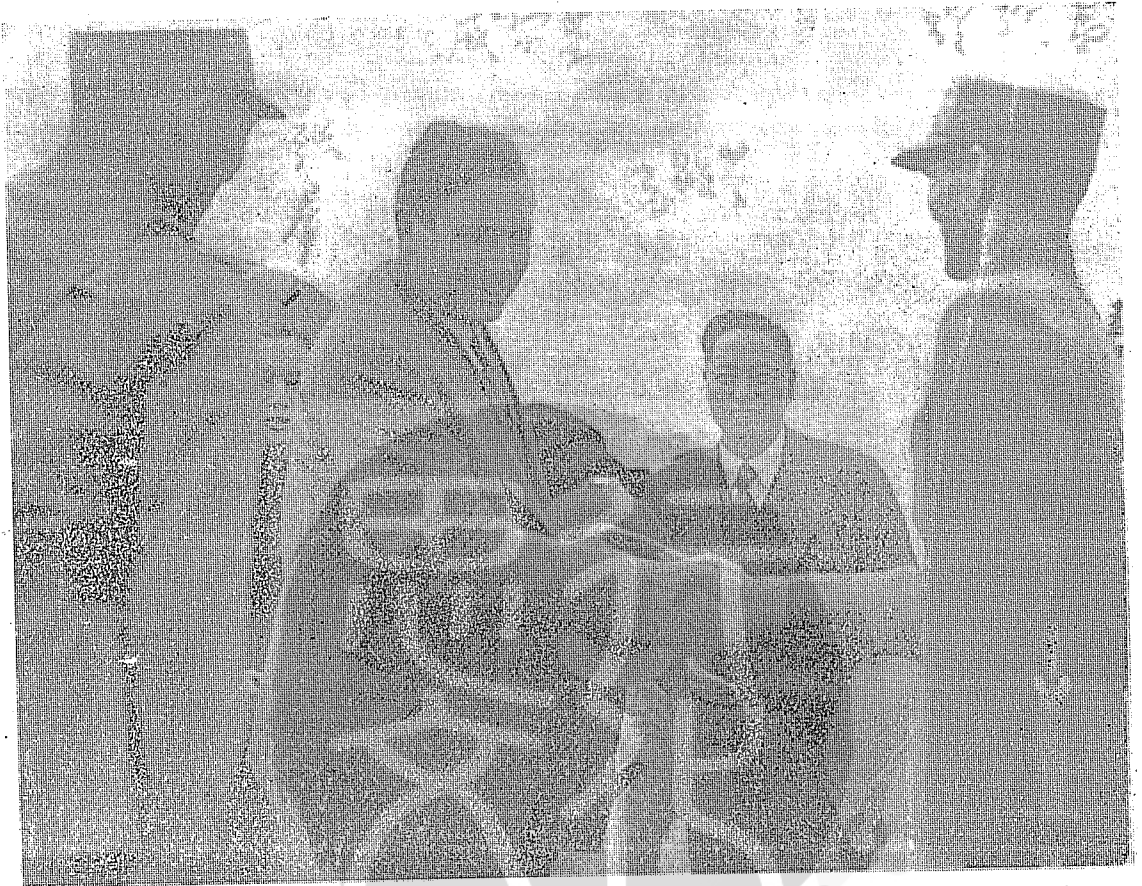
我於民國三十年冬，卸去四川遂寧縣縣長職務，來到戰時陪都重慶，應邀任業師段書貽（錫朋）先生所代主持之中央訓練委員會（主任委員為陳誠辭修先生，時在湖北沙市前作戰）編審職務。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，遇到了晚年在台受謗的老友顧希平兄，他當時以西北幹訓團教育長的身份，晉謁段先生。他與我在抗戰前有一段從事報業的淵源。他任南京中國日報副社長，代理社長。康兆民先生任社長，我兩任總編輯。他當時要去成都中央軍校任政治部主任。軍校對外發行，有一份命名黨軍日報的報紙，行憲後改名黃埔日報。同時政治部虛懸了一名主管編審業務第三科科長的缺。他面邀我去成都担任這兩個職位，我志在辦報，答應了他。我報准了段先生，因此去了成都。從此與當時任軍校教育長萬武樵先生發生了間接的僚屬關係，也開拓了我後此三十餘年的政治生涯。

軍校各業務單位，每年例有年終檢查。檢查結果，評定優劣，以為獎勵的標準。黨軍日報，雖為對外發行的報紙，却為軍校業務單位之一。

黨軍日報，非民間報紙，對外業務不發達，經費奇窘，全恃校部的補助挹注。我接任社長以後，改任黃曼達兄（現任職行政院新聞局）為廣告部主任，後升任總經理。黨軍日報對外發行不廣，發行與廣告，是互為正比例的。我們用同類廣告的方法，誘使同業競爭，刊登廣告，一時廣告收入大增；同時，改良了印刷，充實了版面，更重要的，是我們用比較的科學記賬方法，列計當日報社經費的盈虧。某年之冬，萬先生率領軍校各單位主管蒞社檢查，問我發行多少，我立時答出，問我報社經費盈虧多少，我也立時答出說當日報社盈多少，虧多少。萬先生聽了以後，謬承嘉許不已。從此獲承萬先生的青睞，隸屬了萬先生的幷幃。萬先生識我於凡庸猥雜之中，萬先生之知人、用人，是不論鄉黨、姻婭、新舊、派系的，是廓然大公的。

善用鼓勵推進工作

民國三十二、三年，毛匪澤東在延安叫黨組聯合政府，玩弄統戰的陰謀，我與當時任報社總主筆湖南岳陽王裕先兄（此人陷鐵幕），為着揭穿這一詭計，呈現其魔影於國人之前，每日輪流寫社論刊行於世，一時成都輿論界，掀起反共的怒



教煌耀萬與觀參校軍央中都成臨蒞華訪(二左)基爾威使特統總國美年一十三國民
。席主羣張為後之基爾威，光顯董為二右，談歡手握(右)長育

潮。當時任四川省府主席張岳公(羣)，曾電話萬先生，稱許黨軍日報為國家在成都的「精神堡壘」。最後，國共破裂，家醜外揚，勞動了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斡旋，調處我們的家務事。我寫了一篇：「我們有何面目？」的文章，力斥匪共之暗結外力，威脅自己的政府，是不智，是無恥。萬先生看見了，大為激賞。軍校每日中午，科長、處長、辦公廳主任、高教班主任、政治部主任，例有聚餐。席位固定，位高者坐上席，位低者坐次席。黨軍日報凡有一文刊出，有可稱之處，必令我移位上席，指出文章的重點，贊譽備至。他是用鼓勵重於責難的方法，導人達於至善。他主持軍校時，是用這種方法，聽說他辦陸大時，也用這種方法，他是想用說服的方法，鼓勵那些為國干城的將帥們。他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時，也用這種方法。來台以後，擔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，我所親見的，他更是善用這種方法。他恪遵領袖的指示，撫慰由大陸失敗來台中高級幹部的創傷，恢復了他們的信心，堅定了他們的信心。

軍校師生鎮變巡行

抗戰時的大後方，是重慶和成都。有鞏固的後方，纔有制勝、取勝的前方。兩者互為環節，有如輔車相依的關係。軍校之在成都，是在訓練國家軍事幹部，既不担任前方作戰的任務，也不負責執行後方治安的勤務。四川軍人，防區制度舊惡習未除，在抗戰前方軍事吃緊之際，因揣測、猜忌、懷疑，而發生動搖。正在蠢蠢欲動之時，萬先生以無比的勇氣，率領軍校全部五千餘

華中小聚

民國三十六年萬耀煌先生（前排左）任湖北省主席兼湖北軍區司令及全省保安司令時與國防部長白崇禧（前排中）在武昌黃鶴樓前留影。



師生，出動了軍校教育上使用的武器——大砲、與坦克——整隊巡行全市——由北較場出發，經春熙路，少城一帶，那些想躍躍一試的野心軍人，頓時為之氣沮，為之懾服，消弭了後方一時一隅之隱患。這驚人的一幕，具見萬先生臨危制變，別有一番智慧和勇氣。

萬先生出身軍人，受了完全軍事教育，自陸軍中學，保定軍校（第一期），陸軍大學，雖非如蔣百里先生之為軍學名家，却是軍事教育的專家。在這方面，領袖依畀之隆，國內無出其右者。他在軍校的成就，軍校校史，載之綦詳。我不是軍人，不能縷述萬一。祇就一點，即可獲得具體證明：抗戰時他在後方，辦理軍事教育，無輝煌的戰功，而領袖却在抗戰勝利的次年春季，發表他出任湖北省府主席，開府武昌，做了國家的封疆大吏，可見他在軍校貢獻的梗概。

成都軍校在當時與四方面有關係，一是任軍政部部长何敬公（應欽），二是主管軍事訓練的訓練部部长白健生（崇禧）氏，三是政治部部长和軍校老教育長張治中，四是對軍校有絕大影響力的陳辭公。萬先生肆應其間，無軒無輊，他採取是：多面接觸，平行應付的態度。他認為他是領袖的幹部，國家的將吏，黨的一份子，祇有聽命於領袖，效命於國家，有公誼而無私情。在舉世滔滔之際，他巍然獨立的襟懷，具見他的高風亮節。

出主鄂政一段曲折

抗戰勝利之後，各省主政人員，先後派出。

萬先生生平有個志願，他的舅父夏先生，曾經做過湖北省省長，他想回鄂主政，服務桑梓。抗戰勝利了，他落了空，無欲然自處的意緒，仍然熱心地照常地規劃着軍校復員的工作。不料，就在這時，安徽發生了皖人治皖的政潮，時任湖北省主席王東原先生發表了湖南省主席，而由薛伯陵（岳）先生繼主鄂政。在渝的湖北紳耆，如何雪竹（成濬）、孔令軒、方子樵諸先生受了皖省政潮的感染，聞訊也提出了鄂人治鄂的呼籲，一時湖北主政人選的接替，因薛先生之飛牯嶺，而成了僵局。在一次領袖召見陳辭公時，辭公推荐了萬先生，仰蒙領袖的面准。我適因公留重慶，某天晨興，與劉某同去兩路口中央通訊社。劉去探聽王東原主湘的消息，何時發表。那時中央社編輯主任唐際清兄（現任國大代表，現在台北，臥病已多年）正在開會，遠遠地告訴我們：「東公已發表，所遺鄂省主席一職，由萬武樵繼任」。我從兩路口回到陝西街的軍校辦事處，立刻搖長途電話，向萬先生報告這一喜訊，他接電話，乍聽之下，他幽默地說，是「馬路新聞」。我即答稱：「下午發布新聞，黨軍日報有稿可查。」

為政醇厚了無機心

萬先生接任不久，突接陳辭公的電報，推薦當時任陝南行政督察專員的余正東，在電文中說

明：「余君政績卓著，請予擢植」。他把電報給我看，說他要發表余氏為湖北行政督察專員，垂詢我的意見，我當時應斷：辭公是要余氏擔任湖北民政廳廳長。後來萬先生晉京述職，請示組府人選——民財教建四廳廳長及省委的人選。他開出的名單是民廳王開化（來台任立法委員）財廳吳嵩慶教廳王文俊（曾任台灣教廳編審會主委。）建廳譚嶽泉（曾任台灣公路局局長，現已退休）晉謁辭公，請示決定，辭公默然不作答，以後晉見二次被婉拒，最後，呈出列名余正東任民政廳廳長的名單。辭公微笑着說：「我說我不管湖北的事，因為我曾任湖北省主席，熱愛湖北，現在又要參末議了。」於是，組府工作完成。在萬先生的心意中，王開化、余正東都是辭公培植的人，兩人都是一樣，而且王開化是前任留下的人，借重駕輕就熟之人，在行政上有許多方便；殊不知辭公用人，是得天下英才而用之，有其器使拔擢之道，王開化已作民政廳長，而余正東僅是一行政督察專員。後來，王開化果然調任軍委會軍事局局長。從上面這一段湖北省府改組的經過，看出萬先生在政治上之無機心處，和在政治上的醇厚處。

走遍全省人才下鄉

萬先生在湖北開府二年，在任期內政績卓著。我們在大陸上政治的結構，是外輕內重之局，在湖北有一個物阜民豐的武漢三鎮，三鎮以外，都是地瘠民貧，自清季以來，都是仰賴中央協款的挹注，作政費的開支，一個大有為的疆吏，要想在省政建設上有所展布，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大非易事，張文襄公在鄂的輝煌建設，是在外

重內輕之局，具有充分的經濟條件下達成的。萬先生深知在這種環境下，要想達到政治清明，民生樂利，唯有從改善基層政治建設着手；而基層政治建設，又唯有從慎選最與人民接近的縣長着手。他號召「人才下鄉」，「縣長重於一切」，他所選用的縣長，一時賢良輩出。他不僅慎選慎用，而且勤於教誨，常常親筆手函，一札十行，細書成文，策勉備至。他常常拿五種遺規中從政遺規的話，訓勉各縣縣長：要在百里之內，使得「婦人孺子之情，無微不至，深山窮谷之中，無遠弗屆」，他的注重人民疾苦，注視民間輿論的精神，求之古代循吏，亦所少有，比之今日民選政府官員，更不多讓。他自己在任兩年之內四次出巡，湖北六十七縣市，鄂東、鄂南、鄂西、鄂北，足跡殆遍。鄂人常謂滿清二百六十八年間，湖北督撫，及民國三十年間，湖北之省長督軍主席，曾無一人如「萬武樵」主席席不暇煖，巡視各縣，廣求民瘼，觀納風謠。以是上下無壅隔之弊，百姓寬息。

他深知縣長一職的重要，在抗戰期間及抗戰勝利以後，縣長的職責，叢集一身，監臨的上司，多達三四十，每一上級的機關，各執本位主義，而各上級機關，都是祈求甚奢，防範甚嚴，縣長處於其間，動輒得咎，當時流行的俗話：「望之如聖賢，防之如盜賊，驅之如牛馬」。「百里侯」之難做，可以想見。萬先生有鑒及此，特賦予縣長以廣泛的職權，並揭示對縣長絕對負責，不僅對現任是如此，就是對卸任也是如此，大過則究，細失則寬。一陳姓留日學生，抗戰時曾任

來鳳縣長，因出巡費用少數的報銷而被通緝，他得悉以後，親自取銷其通緝，一時聞風興起，循良之士，皆不視作縣長為畏途，在位者，皆思大有作為，放手做事。政風頓時不變。

在實踐院循循善誘

總統 蔣公於政府播遷台灣以後，為重振革命精神，恢復革命信心。特創辦革命實踐研究院，調訓忠貞幹部。為建設台灣，光復大陸，作積極之佈置。萬先生受 領袖特達之知，在 領袖指導之下，出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，一時志節之士，効命馳驅，踴躍參加，革命空氣的高漲，不讓於當年的黃埔。萬先生受命主持其事。以六十四五歲的高齡。清晨五時即起，晚十二時就寢，終日勞瘁，不遑寧處，他當時兼任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，不乘轎車，而乘破舊的吉甫車，上下陽明山，每日顛躓道途之中。他與研究員一同起居作息，一同隨堂聽講，一同演習操練，與研究員生活打成一片，摒棄當年中央訓練團的訓練方式，採取潛移默化的方式，受訓人員，受其身教之感召，大家都堅定了革命的信心鼓舞了革命的志節。把陽明山的革命氣氛，瀰漫於全島，散播於全國。

萬先生辯材無礙，操湖北官話的口音，每一期訓練開始的當日，例由他作一篇入院的報告詞，為時約一小時的講述中，他遵照 院長的訓示，剖析當前的局勢，指陳漢奸必亡，共匪必滅的道理。他譬喻周至，反復叮嚀辭意懇切，感人肺腑。有時妙語解頤，有時慷慨激昂。大家於入院之初，聽了他這番話以後，都有脫胎換骨，氣質

一新的感覺。

留心人才着重考評

萬先生遵循 院長選、訓、用合一的訓示為國求才，他特別重視受訓人員的考核，創立了留院結業研究員，留院輔導委員制度，專司其事。他平時與研究員生活在一起，瞭解每一研究員言行習性，入院之初，各寫有一篇自傳，他都逐一詳閱，夷考其生平，旁詢其親友，並常多方調查其在大陸的政績業績。他把這些資料，記入一隨身攜帶小冊中，作為考評的參考。每期考評會議中，羅列各受訓研究員的資料，他親自主持評定等第，審定評語。他博訪周諮，察納眾言，一字一語，務求允當。作者忝司幕僚業務，曾有一次，評及文豪許君武兄，他知作者與其交深，面諭作者提供意見。他的綜核名實，毫不苟且的作風，可想而知。當時陽明山的考核評語，大有「一字之褒，榮於華袞，一字之貶，嚴於斧鉞」之概。

萬先生奉命主辦研究院黨政班凡十七期，受訓者近萬人，平日受其身教，感人之深，萬流景仰，聲震朝野。他治療肝疾，赴日就醫。臨行之日，送行者竟至二千餘人，一時冠蓋滿機場，途為之塞，登機而飛。有如郭林宗之歸太原，「眾望之登東而馳，以為神仙焉」。他物望之隆，達到其一生燦爛歷史的頂點。

不樹派系亦無官氣

萬先生從不與人結「政治姻緣」，與部屬不結「政治契約」，他帶兵數十年，部屬滿軍中，辦教育訓練一二十年，桃李滿天下。他公門無私語，個人無羣衆，從不樹立壁壘，自成派系。他

祇是一心一意為 領袖培植幹部，為國家造就人材。他平日啓迪訓誨部屬如此，其自持自律也是如此。他在陽明山莊一再舌敝唇焦，曉諭受訓人員，痛陳大陸上派系之誤國。空谷足音，令人猛省！

萬先生一生從政，衣食仰給於官，退休以後，淡泊自甘，居無華屋，行無轎車。他保身懷方，從無怨對之言。平日居家，以讀書寫回憶錄自娛，他不矜伐昔日的功勳，誇耀以往對國家的貢獻，他所念念不忘者，是他對 領袖未盡到應盡的責任，對國家未盡到應盡的義務。他確實做到了古人所謂：「忠臣去國，不潔其名」的修養。

萬先生出身軍人，待人接物，恂恂然如粹然儒者，平日接見僚屬，都是霽色相對，從無詬誶斥責之聲。即使僚屬有不盡心盡力之處，他也是旁敲側擊，曲予原有，使人感愧，而知奮發改正。他對部屬，用做官式頤指氣使的方法少，用教育式循循善誘的方法多。作者督政鄂南，有時為他撰擬省參議會施政報告詞，深夜在旅社著筆，次晨督見，他先必親令庖人精製湖南口味，佐以早餐，再核閱講稿，遇有不愜意處，他繞灣抹角和顏悅色，指陳缺失，絕不正面呵責，更不會勃然色怒，當面過不去，最後必定稱勞稱謝而罷。

萬先生的一生豐功偉烈，炳耀人間。自參加辛亥革命，有佐命之功，以至北伐、剿匪、抗戰、戡亂，無役不從，為國家盡瘁，達半世紀以上之久，功在國家，將來國史會有翔實的記載，作者以上所舉，不過從細微處，窺其大節罷了。